**第二章 中国:日本的路标**

1、制定“宪法”推行改革

著名旅日作家陈舜臣在《中国人和日本人》中写道，“中国式树立路标的民族，而日本则是循着路标前进的民族”。

所谓儒敎文化圈或汉字文化圈，主要由汉字、儒教、佛教、律令制构成。构成日本文化的这四大要素，均传自中国。

公元6世纪中叶是日本历史上的重要时期。因为，当时推行的推古朝改革，使律令制在日本奠基。按醍醐天皇当政的弘仁年代编纂的法律法令集《弘仁格·弘仁式》序言中的说法：“国家制法自滋始焉”。用今天的话说进行解释，就是日本开始“依法治国”。

推古天皇登基后，用明天皇的皇子、年方19的圣德太子摄政。“圣德太子”是其谥号。所谓“圣德”，是称赞其身具佛德、深谙佛法。圣德太子的本名是厩户皇子。 圣德太子在内政方面最重要的改革，是制定官员等级制——“冠位十二阶”，以及制定官员必须遵循的“宪法十七条”。

所谓冠位十二阶，即将官员分为大德、小德、大仁、小仁、大礼、小礼、大信、小信、大义、小义、大智、小智的一种官阶制度。冠位十二阶将作为儒教最大道德准则的德置于第１位，然后依次是儒学强调的、必须奉行的五常，即仁、义、礼、智、信，共十二阶，充分显示了推古朝对儒学的重视。同时因采用不同颜色的絁制成的“冠”作为官位等级的标志，故称“冠位十二阶”。各阶官员不仅冠位不同，衣服的质地和颜色也不同。

需要说明的是，冠位是天皇授予朝廷和地方豪族、官员作为其身份的标志，和当时的氏姓制度并行不悖。姓氏强调的是家族，注重血统；冠位强调的是个人，注重功业。推古朝制定的冠位十二阶，是使以姓为基础的强调血缘的秩序，向强调功绩的官员秩序转变的重要开端，对打破世袭，形成社会流动，为个人通过努力“立身处世”，奠定了重要基础。

圣德太子的另一项重要改革，就是制订作为官员行为准则的“宪法十七条”。《日本书纪》推古十二年（604年）条，有宪法十七条全文（显示十七条全文即原件、配音乐）。

宪法十七条之“宪法”当然不是现代意义的国家根本大法（constitution）。但是就功能而言，十七条宪法在规范社会秩序和人类行为方面，有几点值得特别关注：第一，宪法十七条强调国家由君、臣、民三大要素构成，即体现了国家的基本社会结构第二，宪法十七条规定了国家的臣僚――公务员应该具备的道德操守和必须服从的纪律规定。第三，宪法十七条虽然具有浓厚的儒学色彩，但并不排斥其他学说。例如，“笃敬三宝”即强调必须尊崇佛教。**总之，虽然宪法十七条是一种训诫，和被称为律令的法律属两个系统。**但是，宪法十七条同律令，特别是令的根本思想是一致的。因此，法律学者视宪法十七条为令的起源。

在外交方面，与以往不同，圣德太子推行的基本路线是走“亲隋”路线。推古朝一次次派遣隋使，主要目的是通过与隋亲善，吸收隋文化。可以认为，日本以后也极力贯彻的向隋唐学习的外交政策，在推古朝时期已经形成。

（**以下十七条宪法供后期制作用，本人不讲。**）

《日本书纪》，推古十二年 “夏四月丙寅朔戊辰、皇太子亲肇作宪法十七条”：

一曰、以和为贵、无忤为宗。人皆有党。亦少达者。以是、或不顺君父。乍违于邻里。然上和下睦、谐于论事、则事理自通。何事不成。

二曰、笃敬三宝。三宝者佛法僧也。则四生之终归、万国之禁宗。何世何人、非贵是法。人鲜尤恶。能教从之。其不归三宝、何以直枉。

三曰、承诏必谨。君则天之。臣则地之。天复臣载。四时顺行、万气得通。地欲天复、则至懐耳。是以、君言臣承。上行下靡。故承诏必愼。不谨自败。

四曰、群卿百寮、以礼为本。其治民之本、要在礼乎、上不礼、而下非齐。下无礼、以必有罪。是以、群臣礼有、位次不乱。百姓有礼、国家自治。

五曰、绝飨弃欲、明辨诉讼。其百姓之讼、一百千事。一日尚尔、况乎累歳。顷治讼者、得利为常、见贿厅谳。便有财之讼、如右投水。乏者之诉、似水投石。是以贫民、则不知所由。臣道亦于焉阙。

六曰、惩恶劝善、古之良典。是以无匿人善、见悪必匡。其谄诈者、则为复二国家之利器、为绝人民之锋劔。亦佞媚者、对上则好说下过、逢下则诽谤上失。其如此人、皆无忠于君、无仁于民。是大乱之本也。

七曰、人各有任。掌宜不滥。其贤哲任官、颂音则起。姧者有官、祸乱则繁。世少生知。克念作圣。事无大少、得人必治。时无急缓。遇贤自寛。因此国家永久、社禝勿危。故古圣王、为官以求人、为人不求官。

八曰、群卿百寮、早朝晏退。公事靡监。终日难尽。是以、迟朝不逮于急。早退必事不尽。

九曰、信是义本。毎事有信。其善悪成败、要在于信。群臣共信、何事不成。群臣无信、万事悉败。

十曰、绝忿弃瞋、不怒人违。人皆有心。心各有执。彼是则我非。我是则彼非。我必非圣。彼必非愚。共是凡夫耳。是非之理、讵能可定。相共贤愚、如镮无端。是以、彼人虽瞋、还恐我失。、我独虽得、从众同举。

十一曰、明察功过、赏罚必当。日者赏不在功。罚不在罪。执事群卿、宜明赏罚。

十二曰、国司国造、勿収敛百姓。国非二君。民无两主。率土兆民、以王为主。所任官司、皆是王臣。何敢与公、赋敛百姓。

十三曰、诸任官者、同知职掌。或病或使、有阙于事。然得知之日、和如曾识。其以非与闻。勿防公务。

十四曰、群臣百寮、无有嫉妬。我既嫉人、人亦嫉我。嫉妬之患、不知其极。所以、智胜于己则不悦。才优于己则嫉妬。是以  
  
、五百之乃今遇贤。千载以难待一圣。其不得贤圣。何以治国。

十五曰、背私向公、是臣之道矣。凡人有私必有恨。有憾必非同、非同则以私妨公。憾起则违制害法。故初章云、上下和谐、其亦是情欤。

十六曰、使民以时、古之良典。故冬月有间、以可使民。从春至秋、农桑之节。不可使民。其不农何食。不桑何服。

十七日、夫事不可浊断。必与众宜论。少事是轻。不可必众。唯逮论大事、若疑有失。故与众相辫、辞则得理。

**2、飞鸟和白凤时代的“三宝”**

据《日本书纪》记载：“（推古天皇二年即594年）春二月丙寅朔，诏皇太子即大臣，令兴隆三宝。” 根据天皇的敕令，在王宫所在地飞鸟、即今天奈良县高市郡，以及大和的外港难波，即今天大阪天王寺区元町等地区，以佛教为中心的飞鸟文化日趋繁荣。日本文化史册，掀开了飞鸟文化璀璨的一页。

所谓“三宝”，即佛、法、僧。佛指释迦牟尼佛；法指佛的一切教法；僧指依佛的教法如实修行、弘扬佛法、度化众生的出家人。

关于佛教何时传入日本，主要有两种说法，一说公元538年，一说552年。也有说在此之前，佛教已进入日本列岛。如根据《叡岳要记》记载，显宗天皇三年丁卯（487年），百枝在志贺的草屋中用泥土塑造了一具长3尺的比丘像，人们见之畏惮。但是，这种说法一般不被用作佛教传入日本的凭信。

不管**佛教何时传入，但其真正繁荣，开始于飞鸟时代**，并成为飞鸟文化的特征，则没有争议，**飞鸟文化最典型的标志，就是当年建造的寺院**。

当时佛教文化传入日本，有三条路径，并因此形成了三种不同的风格。第一条路径，是位于大陆北部的北魏的佛教文化经高句丽传入日本列岛。例如，法兴寺明显留有北魏佛教文化的痕迹。第二条路径，是位于大陆中部的北齐、北周（南朝）的佛教文化经百济、新罗传入日本列岛，以广隆寺、中宫寺的弥勒佛像等为代表，具有理智、柔和的风格。第三条路径，从重新统一中国的隋朝直接传入，以播磨国一乘寺的观音菩萨像、播磨国鹤林寺的圣观音像为代表，这些佛像严肃中透出轻妙。也就是说，朝鲜半岛在当时扮演着将中国的佛教文化传向日本的“中介”角色。

在飞鸟时代，法兴寺（又称飞鸟寺）、四天王寺、法隆寺(斑鸠寺)，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三个寺院，而且其以基石、瓦葺等新的技术手法修建的寺院伽蓝，鲜明地体现了大陆的寺院建筑风格。寺院中的佛像雕刻，如法隆寺金堂释迦三尊像，显然受到了中国北朝佛雕风格的影响。法兴寺（飞鸟寺）作为日本佛教兴隆的标志，不仅在日本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是日本大陆文明摄取史上的一块里程碑。

1956年至1957年，在奈良国立文化财研究所组织下，日本考古学者对法兴寺遗址进行了发掘，发现**既吸收外来文化、又保持传统文化，是飞鸟文化的一项重要特征。**也就是说，日本吸收大陆文化，并不仅仅是照搬。

四天王寺建于大和的外港难波，即现在的大阪天王寺区元町，也是飞鸟文化的代表。1955年至1957年，日本文化财保护委员会对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结果显示，四天王寺的伽蓝的南大门、中门、塔、金堂、讲堂呈南北一直线状，周边设有回廊，这一格局和百济最后的都城扶余的一些寺院的格局一致。同时值得注意的是，之所以称“四天王寺”，就是在寺内供奉着“四大天王”，说明日本在7世纪初已有祈愿四大天王降伏外敌的信仰。

法隆寺全名为法隆学问寺，别名斑鸠寺。[公元607年](http://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213150&ss_c=ssc.citiao.link)，由[推古天皇](http://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222411&ss_c=ssc.citiao.link)根据先帝[用明天皇](http://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321732&ss_c=ssc.citiao.link)的遗命与圣德太子一起修建，建筑风格受中国南北朝建筑的影响。寺内有40多座建筑物，其中最具有标志性的建筑，是五重塔。自6世纪末开始营造的日本寺院，无疑是佛教文化的象征。但非常遗憾的是，这些珍贵的文物，历经自然的侵蚀和人为的破坏，绝大多数已不再是耸立于地面的建筑，而是藏身于地下的古迹。但是，虽然当年的寺院大都已“作古”，但是，寺院内部一些展示日本早期佛教魅力的宝物，却有不少流传至今，如佛像有法隆寺的释迦三尊像、救世观音像、百济观音像、金堂四天王像，广隆寺和中宫寺的半跏思维像等。工艺品有法隆寺的玉虫厨子；绘画有中宫寺的天寿国绣帐断片等。

以佛教文化为轴心的白凤文化，因650—654年的白雉年号而得名，指大化改新至迁都平城京，即645年至708年。白凤文化前期受大陆六朝文化影响，后期受唐朝文化影响。在这一时期，各朝天皇实施**佛教国教化**，建造了大官大寺、药师寺等多所官寺，同时，各地贵族也纷纷建立自己的氏寺。据《扶桑略记》记载，当时日本全国共建有寺院545所。现代考古发掘，发现了大量有白凤文化特征的寺院遗迹，数量和《扶桑略记》记载的数量大致相符。

白凤文化留存至今的代表性佛教建筑有药师寺东塔、山田寺回廊等，雕刻有药师寺金堂药师三尊像等，绘画有法隆寺金堂壁画、高松冢古坟壁画等。

白凤文化中的佛教文化意义不可估量，但更不可估量的，是“日文”真正开始形成，并因此使日本真正拥有了自己的“语文”；**使日本文化通过对汉文化的吸收，在由历史积淀构成的纵轴和各民族文化构成横轴的世界文化的坐标上，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日本文化**。而使日本感受到中国强大的，不仅是文化，更是军事。日本如何感受到中国唐朝军事实力的强大，是我下节课要讲授的内容。

**3、白江之战和遣唐使**

公元7世纪60年代初，朝鲜半岛上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鼎立。三国各雄心勃勃，试图完成统一霸业，但因力不从心，于是分别求助唐朝和日本，形成了以高句丽、百济、日本为一方，新罗、唐朝为另一方的对峙格局。

660年，百济向新罗进攻，新罗向唐朝求援，唐高宗遂命苏定方率水陆大军十万余，从成山（今山东荣城）渡海攻击百济。在唐军南北夹击之下，百济军队迅速作鸟兽散。接着，唐朝和新罗联军向百济都城泗沘进军，不到十日，便迫使百济义慈王签城下之盟。

661年初，日本齐明女皇和中大兄皇子（即后来的天智天皇）亲赴九州岛，欲统兵渡海西征援助百济，但齐明女皇因旅途劳顿，于当年七月病死，出征计划被迫推迟。8月，中大兄皇子监国，令先遣部队及辎重渡海。9月，5000日军护送百济王归国即位。

662年正月，日本向百济赠送大批物资，同年5月，日军舟师170艘亦前往增援。

663年3月，日本又增兵2.7万人，唐朝也任命右威卫将军孙仁师为熊津道行军总管，统舟7000进驻熊津城（今韩国公州），白江海战随即拉开战幕。据朝鲜《三国史记》记载：“此时倭国船兵，来助百济。倭船千艘，停在白沙。百济精骑，岸上守船。新罗骁骑，为汉前锋，先破岸阵。唐军左右夹船绕战，巧施包抄合击之术，致日军赴水溺死者众，舻舳不得回旋”。据《旧唐书·刘仁轨传》记载：“仁轨遇倭兵于白江之口，四战捷，焚其舟四百艘，烟焰涨天，海水皆赤。”白江之战，百济王逃亡高句丽，残军全部投降，百济复国梦想，彻底破灭破灭。

667年，唐朝和新罗联军继续挥师征伐，翌年攻陷平壤，存在705年之久的高句丽灭亡。唐朝自此确立了在东亚地区的霸主地位，这一地位在甲午战争后被颠覆。

668年，中大兄皇子即位，成为天智天皇。战败之惨痛教训，迫使天智天皇审时度势，恢复与强盛的大唐帝国的国交，并积极选派遣唐使，全方位学习唐朝的政治、经济、文化。

“遣唐使”原本并不专指日本遣唐使节。西自丝绸之路沿途、南自印度尼西亚半岛的热带雨林、北自蒙古大草原和西伯利亚森林，凡前往大唐的各国使节均为“遣唐使”。据《新唐书》记载，当时和唐朝通交的国家达50余国。但是，“遣唐使”所以成为受日本朝廷派遣，前往大唐的专有名词，但最重要的原因是遣唐使树立的航塔和路标，在很大程度上为日本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但是，对日本遣唐使的活动及其内容，记载最详细也最权威的《续日本纪》，也没有关于遣唐使活动及其内容的全面记载。但是，通过片断性的记载以及其他相关“链接”，我们可了解其基本内容及其特征。

日本拟派遣18批遣唐使（显示列表），并未全部成行，其中真正具有意义的是669至733年的第7批至第10批遣唐使。据历史记载，之前遣唐使规模均只有1、2艘船组成，人数为120人，而这几批遣唐使团规模庞大，一般为4条船，其中第8批为557人，第9批为594人，第10批约500人，为白江之战前的3倍。著名的鉴真东渡，即发生于764年。在此之后，由于安史之乱，唐朝趋于衰落，日本派遣唐使的积极性显著下降。因此，这一时期中日间文化和经济交流最为兴盛活跃，出现了许多彪炳史册的人物，其中最著名的是两个人：阿倍仲麻吕和吉备真备。按《续日本纪》记载，“我朝学生名字播撒唐国者，唯大臣和朝衡二人。”大臣是吉备真备，朝衡是阿倍仲麻吕。

关于“遣唐使”，有几点需要强调：第一，岛国日本遣使赴唐承载很大风险甚至生命危险，所以仍有人愿意冒险自愿参与，是因为可以免除3年赋税。第二，遣唐使的行动受到严格监控。例如，据9世纪遣唐僧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记载，当时1个遣唐使节团成员只是想在市场购物，但当即被衙役逮捕。第三，遣唐使实际上是代表天皇要求唐朝皇帝谒见。”第四，遣唐使以“小帝国”使节自居的意识，以及 “小中华”意识和中国“大中华”和“蕃属”意识的矛盾，昭然若揭。第五，作为遣唐使成员的留学生和留学僧，既有返回日本者，亦有“自愿”留在唐代中国者，有些人成为改善中日关系的桥梁。第六，遣唐使向大唐皇帝晋献的物品，一是珍贵物品，二是急需物品。遣唐使回到日本，亦带回大量大唐朝廷“赐予”的珍贵物品，特别是绚丽璀璨的大唐文化的象征。例如，735年回国的吉备真备带回了《唐礼》130卷、大量关于历法、音乐的汉籍，以及乐器、武器。玄昉僧则带回了“经纶五千余卷”。**这些汉籍和经纶，以后无疑成为日本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史的一个个路标，影响不可估量。**

尽管遣唐使等通过向中国学习，使日本的律令制得以完善。但是，日本的政治制度即便在当时也有自身的特点。什么特点？请听我下节课讲述。

遣唐使年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批次 | 出发年 | 返回年 | 船只数量 | 人数 | 航线 | 备注 |
| 1 | 630 | 632 |  |  | 北路 |  |
| 2 | 653 | 654 | 1 | 121 | 北路 |  |
|  | 653 |  | 1 | 120 | 南路 | 遇难 |
| 3 | 654 | 655 | 2 |  | 北路 |  |
| 4 | 659 | 661 | 2 |  | 北路 |  |
| 5 | 665 | 667 |  |  | 北路 |  |
| 6 | 669 | （670） | ？ |  | 北路 | 送唐朝使节 |
| 7 | 702 | 704 |  |  | 南路 | 山上忆良等随行 |
| 8 | 717 | 718 | 4 | 557 | 南路 | 吉备真备、玄肪等 |
|  |  |  |  |  |  | 阿倍仲麻吕等 |
| 9 | 733 | 734 | 4 | 594 | 南路 | 1船遇难、1船触礁 |
| 10 | 752 | 753 | 4 | 约500 | 南路 | 吉备真备等同行 |
|  |  | －754 |  |  |  | 鉴真和尚赴日 |
| 11 | 759 | 761 | 1 | 99 | 渤海路（出） | 与唐使从南路返回 |
| 12 | 761 |  | 因船只 | 损害 | 中止 |  |
| 13 | 762 |  |  | 因风向 | 原因中止 |  |
| 14 | 777 | 778 | 4 |  | 南路 | 归途1船触礁 |
| 15 | 779 | 781 | 2 |  | 南路 | 送唐朝使节 |
| 16 | 804 | 806 | 4 |  | 南路 | 最澄、空海同行 |
| 17 | 838 | 839 | 4 | 511 | 南路 | 3船遇难 |
|  |  | －840 |  |  |  | 1船触礁 |
| 18 | 894 |  | 采纳菅原 | 道真的 | 建议停止 | 派遣 |
|  |  |  |  |  |  |  |

**4、摄政·关白·院政**

公元710年，日本迁都奈良。710年至794年是日本以平成京即奈良为都城的**奈良时代**。除了迁都，当年日本朝廷还作出了一项对日本社会经济发展产生影响深远的决定：铸造“本朝十二钱之嚆矢”——和同开珎。所谓“本朝十二钱”，就是自708年的和同开珎，到958年发行干元大宝，共12种货币。所以将“和同”二字熔入货币，是希望人们能彼此信赖和睦相处，通过公平交易，促进商品经济繁荣。当时日本朝廷还颁布了“关市令”等保障公平交易的法令。按照吉田孝的观点，“‘和同开珎’和‘平城京’是律令国家的象征。”

奈良时代是日本**全方位向唐朝学习**的时代。但是，正如中村修也在《续日本纪的世界》一书中所指出的，“在以正仓院宝物为代表的华丽的唐风文化这一现象的背后，该时代也是接连不断的**叛乱、谋反、政情不安和混迷**的时代。”

奈良时代共共经历8代天皇，其中元明、元正、孝谦是女皇，[圣武天皇](http://www.qiji.cn/drupal/wiki/goto/å£æ­¦å¤©ç)虽在位25年，但实际由光明皇后掌权。在位6年的[淳仁天皇](http://www.qiji.cn/drupal/wiki/goto/æ·³ä)也受孝谦女皇的操纵，因此奈良时代被称为“女人掌权的时代”。

在迁都平安京即今天的京都以后，按照西山良平的说法，“9世纪，王权确立了同其他贵族和王族隔绝的绝对权力。但另一方面也形成了王权固有的特征，即虚弱的天皇和幼帝接连登基。”以宫廷的这一特征和社会变动为背景，藤原良房占据权力中枢的“摄关政治”开始形成。

按照《日本史广辞典》的释义：“摄政是指奉敕命替天皇代行国政，或代行国政者。平安时代以后始于藤原良房。**之后，藤原氏作为天皇外戚在天皇幼时为摄政、成人后为关白，成为通例。**其权限为代拟诏书、代批论奏，参与决定叙位（赐予官员冠位）、任命官吏。”

藤原良房能够在朝中独揽大权，巧妙利用嵯峨上皇治下的王室芽檗出初生的矛盾，是他一大手段。承和九年，即公元842年7月，日本朝廷发生了一场因废立太子而引发的政变，这场政变也是[藤原氏](http://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64343106&ss_c=ssc.citiao.link)排挤政敌而采取的第一次行动，史称“承和之变”。政变之后，事变之后，皇太子恒贞亲王被废，道康亲王被立为皇太子。仁明、文德、清和等“虚弱的天皇和幼帝”接连登基。例如，仁明天皇自幼体弱，41岁驾崩；文德天皇天年更短，33岁晏驾；天安二年，即858年，藤原良房的外孙惟仁亲王9岁就登基成为清和天皇。这为天皇外戚藤原良方摄政，创造了重要条件，他的后人藤原道长（966年-1027年）更是连当四代天皇的岳父，用几天的话说，属于“超级牛人”。

“关白”是“辅佐天皇统理大政的职掌、地位。”职掌的核心是“内览”，即“政务公文在奏上、宣下之前首先经关白审阅。” 一般而言，天皇元服（12至15岁，武士等须举行成人礼）前，执掌实权的为摄政，之后则为关白。二者基本上换汤不换药，因此往往统称“摄关政治”。自冷泉天皇即公元950年开始，摄政、关白被设定为固定职位。

“院政”是平安时代末期继摄关政治之后出现的政治形态。在当时，天皇主动退位让太子继位为上皇，若皈依佛门则为法皇。**院政就是“由上皇或法皇在院厅主理国政”。**院政是在白河天皇主动退位成为上皇时确立，名义上持续至江户末期的光格天皇时期，但实际上在镰仓末期后宇多天皇时结束，历时250多年。也就是说，实际从1192年延续至1324年，约130年时间。

不过，当时并没有“院政”这一术语。“院政”这一术语的首次亮相场所，是江户时代末期赖山阳撰写的《日本外史》。至明治时代，“院政”作为历史学术语被广泛采用。在摄关政治时期，天皇的地位为外戚藤原氏左右，而院政则由上皇掌握天皇的任免权。上皇的执政机构是附属于上皇处理政务的机构，称“院厅”。

公元1156年7月，以后白河天皇及其支持者平清盛、源义朝，和崇德上皇及其支持者平忠正、源为义为对阵双方的“保元之乱”，为院政提供了历史舞台。美川圭的《院政》一书，在论及“保元之乱的历史意义”时写道：“**保元之乱将摄关家主流藤原忠实和藤原赖长逼上绝路，最后走向灭亡**。”当然，“保元之乱”也为**武家政权的建立，留下伏笔**。关于这方面的情况，容我以后再叙。下一节课我要讲的是在日本历史上具有重大影响的佛教宗派的形成。

**5、佛教宗派的形成**

2011年7、8月间，我作为中央电视台《日本文明》摄制组的学术顾问，跟随该摄制组几乎跑遍整个日本，在和歌山县日本佛教圣地高野山真言宗（又称密宗）的总本山金刚峰寺，拍摄了这幅日本的国宝——释迦牟尼涅盘图。这一课，我就从释迦牟尼涅盘说起。

相传佛陀释迦牟尼80岁涅盘、寂灭后，大约自公元前3世纪左右，佛教开始向外传播，主要分成三支：一支从犍陀罗，即今天的巴基斯坦进入中国西域、中土，之后传向东北亚，即北传佛教，俗称大乘佛教；一支从今天的斯里兰卡传入东南亚，即南传佛教，俗称小乘佛教，但这种称呼不太恭敬，正式名称应是南传上座部佛教，另一支大约在7世纪传入中国西藏，俗称藏传佛教。（示图）

佛教传入日本后，在奈良时代开始形成六个宗派，通称“南都六宗”。

“奈良系佛教”（通称“南都六宗”）：法相宗、华严宗、律宗、（三论宗、成实宗、俱舍宗）。其中后三个宗派今天已不复存在。当时的寺院有所谓“南都七大寺”，即东大寺、西大寺、兴福寺、法隆寺、元兴寺、药师寺、大安寺。（依次显示作为各宗总本山的各寺。略）

“奈良佛教”有以下几项基本特征：第一，“**国家化**”。历代天皇均采取保护佛教方针以期“镇护国家”，使佛教具有“国家佛教”特质。第二，“**国际化**”。中国盛唐时代热衷于汲取异国文化，受之影响，奈良佛教具有“国际化”的色彩。第三，“**贵族化**”。具有异国情调的工艺美术品的雕琢等文化的“贵族化”趋向，显现于这一时期。

继7世纪后半至8世纪初的白凤文化之后，通过向唐代中国的学习，日本出现了以圣武天皇当政的天平年代，即729至749年为中心的“天平文化”。我们可以通过一个图表，浏览一下天平文化的概况（后期插入，略。）

天平文化有几方面值得关注。第一，天平文化虽然也具有浓郁的佛教文化色彩，但随着统一国家的形成，佛教扮演“镇护国家”的角色，愈益明显。第二，飞鸟文化和白凤文化的佛教艺术，已经具有希腊、西亚文化的明显留痕。但是，由于中国盛唐时代是更热衷于汲取异国文化的时代，因此天平文化的“国际化”色彩更浓。搜集天平工艺美术之精华的东大寺正仓院宝物，就洋溢着西域文化的浓郁气息。第三，与“国际化”相对应，“贵族化”也是飞鸟、白凤、天平文化共通的特色。第四，**留存至今的日本历史、文学、法律等领域的经典文献，几乎全部都是在奈良时代完成的**。天平文化则是奈良时代的一块文化丰碑。

“天平文化”概览

|  |  |  |
| --- | --- | --- |
|  |  | 内 容 |
|  | 时期  空间 | 以圣武天皇天平年间（729－749年）为中心  以都城平城京为中心 |
|  | 特征 | 受唐代中国文化的强烈影响（由遣唐使传播了大量唐代中国文化）  通过唐代中国接触了“地中海世界”，即希腊·罗马、波斯、中亚、印度的文化影响，使日本文化具有“丰富的国际色彩” |
| 宗  教 | 国家佛教 | 建成东大寺（大佛）、国分寺、国分尼寺  形成南都七大寺：东大寺、西大寺、兴福寺、法隆寺、元兴寺、药师寺、大安寺 |
| 工  艺美术 | 建筑 | 东大寺“法华堂”（三月堂）  东大寺“正仓院”（校仓造）  唐招提寺“金堂、讲堂” |
|  | 雕刻 | 东大寺法华堂“不空羂策观音菩萨像”  “日光、月光菩萨像”  “执金刚神像”  东大寺戒坛院“四天王像”  兴福寺 “阿修罗像”  唐招提寺 “鉴真和尚像” |
|  | 绘画工艺 | 正仓院 “鸟毛立女屏风”、药师寺“吉祥天画像”  “御物”（螺钿紫檀五弦“琵琶”、碧琉璃“杯”等  药师寺 “吉祥天画像” |
| 文献 | 历史  方志  和歌  汉诗 | 《古事记》、《日本书纪》  《常陆风土记》、《出云风土记》、《播磨风土记》、《肥前风土记》《丰后风土记。  《万叶集》  《怀风藻》 |

佛教虽然在奈良时代已形成宗派，但并不严格。宗派的形成，主要是在平安时代。虽然日本佛教在9世纪只有最澄和空海两位高僧分别创建的天台宗和真言宗，但是这两个宗派和“南都六宗”一起构建了国家佛教体制。平安时代，佛教诸宗既独立形成了各自教学体系，又彼此影响渗透。

“平安佛教”在日本佛教史上呈现贵族化、世俗化倾向。此后，在镰仓时代，日本又形成了5个宗派，史称“镰仓新佛教”。其中除了日莲宗是日本独创的之外，其余禅宗、净土宗等均传自中国。镰仓时代有一句流行语：“天台宗属于官家，真言宗属于公卿，禅宗属于武士，净土宗属于平民。”关于佛教在镰仓时代的发展，我们以后再谈，下一章我要讲授的是。“和风”如何在中国唐宋文化的影响下形成。